

# 天文分野：文学地理学的思想来源及意义

王洪军

**内容提要** 天文分野就是将周天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，并与历史事件相联系，建立起可以识别地域（人君）吉凶祸福的一种学说。春秋以降，二十八宿、十二次与九州等分野，确立了星象与方国、地域之间的对应关系。到了汉代，分野学说更加系统化、理论化，并且在礼乐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的参与下，星宿、地域、音乐、文学之间建立起复杂的关系。随着文化的流变，天文分野渐次衍生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，形成文学意象；而其中的吉凶祸福观念，也构成了天命文学的主题之一。星土分野影响下的地理区域、地理空间的划分以及不同地理空间所形成的地域特色、风俗习惯、文学表现则成为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逻辑起点。

**关键词** 星土分野；风俗习惯；文学地理学；叙事模式

天文分野是星占术发展的产物，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天地感应来窥知天意，即通过自然传达出来的信息，把握政治的脉搏以及历史未来发展的趋向。“分野”一词，最早见于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，周景王二十三年（前522），伶州鸠以为武王伐纣，岁星在鹑火，“岁之所在，则我有周之分野”。“分野”，亦可称为“分星”。《周礼·春官》保章氏之职“以星土辨九州之地，所封封域，皆有分星”。“分星”“分野”之说，由来已久。苏伯衡云：“分野之说，其传也远，而《周礼》、《春秋传》始详焉。……至汉《地理志》言分野，乃为始详密。”<sup>[1]</sup>有关分野记载，历史较悠久的是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所云：“陶唐氏之火正阍伯居商丘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。”由此可知，天文分星最早是和天地崇拜息息相关的。

星土分野理论建立的直接目的是服务现实政治，即将天官与人官、诸侯国以及山川之间建立起象物、象官、象事的特定联系，明确洞悉“天何言哉”，以此建构起复杂的天地人关系，呈现并不断渲染、强化政治命意。由于礼乐文化的参与以及民俗学的刻意渲染，分野理论建构的星土空间，促生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，也带来了文学想象空间的释放，这是天文分野学说产生的溢出效应。

## 一 天人合一与星土妖祥关系的建立

《周礼·保章氏》云：“以星土辨九州之地，所封封域，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以十有二岁之相，观天下之妖祥。”就是将九州地域上的封土（封国）与天上的星宿建立起对应关系，古人称之为星土分野，其目的即是观“妖祥”。在天人感应以及天命观的驱动下，星辰的变化牵系着敏感的政治神经，识别和判断天象的变化即上天的言说，成为“传天数者”的重要责任。如果说上天已经指示了吉凶，而分野的直接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是何方、何地，甚至是何人之休咎。

鲁襄公九年（前564）春天，宋国火灾，晋侯问士弱“天道”，士弱回答：“古之火正，或食于心，或食于味，以出内火，是故味为鹑火，心为大火。陶唐氏之火正阍伯，居商丘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。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。商人阅其祸败之衅，必始于火。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。”<sup>[2]</sup>晋侯所谓的天道就是分野理论。士弱以为，尧的火正阍伯，居住在商丘，祭祀大火星，相土继承了这一传统，于是商人主大火星，火星也就成为商人的分星。

春秋时期，商人主大火星已经成为共识。鲁僖公十八年（前642），身在齐国的重耳贪享安逸，夫人齐姜进行劝诫，其事见于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吾闻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实纪商人。”五年后，大致的内容出现在史官董因的口中。《国语·晋语四》载，鲁僖公二十三年（前637）十二月，秦伯纳晋公子重耳。“董因迎公于河，公问焉，曰：‘吾其济乎？’对曰：‘岁在大梁，将集天行。元年始受，实沈之星也。实沈之墟，晋人是居，所以兴也。……君之行也，岁在大火。大火，阏伯之星也，是谓大辰。辰以成善，后稷是相，唐叔以封。……济且秉成，必霸诸侯。’”将齐姜和董因的相关言论与鲁昭公元年（前541）子产的论述相结合，能够清晰地看到商人主大火星之说形成的脉络。子产曾说：

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阏伯，季曰实沉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。日寻干戈，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阏伯于商丘，主辰，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沉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。<sup>[3]</sup>

阏伯是商人的先祖，被迁徙到商丘，主祀辰星，所以辰星是商人的分野。“大辰者何？大火也。”<sup>[4]</sup>东方苍龙七星，其心宿有三星，中央最明亮的一颗就是大火星，即心宿二，故心星称为大火，亦称大辰。辰星，或者说火星、心星，是商的分野，与之对应的区域在商丘一带。《毛诗谱》曰：“商德之坏，武王伐纣，乃以陶唐氏火正阏伯之墟，封纣兄微子启为宋公，代武庚为商后。”<sup>[5]</sup>宋国封地商丘，奉商汤之祀，宋的分野就是大火（大辰）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大辰，房、心、尾也。大火谓之辰。”<sup>[6]</sup>显然，大火星由房、心、尾三星组成。董因说的实沈之墟，就是大夏之墟，唐叔虞始封于夏墟，所以“启以夏政”，子燮徙居晋水，故又称晋侯，实沈也就成为晋人的分野。

商人的分野，典籍中出现很晚，但其文化渊源十分悠久，甲骨文就有祭祀火星的卜辞。有关周人分野的记载，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。周景王二十三年，景王问律于伶州鸠，后者答曰：“昔武王代殷，岁在鹑火，月在天驷，日在析木之津，辰在斗柄……岁之所在，则我有周之分野也。”（《国语·周语下》）岁星即木星，约十二年一周天。古

人认为，其国兴起之年，岁星所在，即为其分野。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，鹑火即周之分野。据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可知，火正或食于心，或食于昧。食于心为大火，食于昧为鹑火。何谓鹑火？鹑火和十二次的分野方式息息相关。简言之，古人将黄道天区自西向东十二等分，以观测岁星的运行轨迹。这十二部分有专属称谓，依次为星纪、玄枵、娵訾、降娄、大梁、实沈、鹑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，称为十二次。大火、鹑火分别是商、周分野，此系就十二次分野而言。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八年》载春天无冰，鲁国梓慎断言宋、郑将有饥荒，理由是“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，以有时灾，阴不堪阳。蛇乘龙。龙，宋、郑之星也，宋、郑必饥。玄枵，虚中也。枵，耗名也。土虚而民耗，不饥何为？”这年岁星本应在星纪，却在玄枵，这就是岁星失次，故梓慎认为宋、郑要受灾。对此，郑国裨灶有不同理解：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，而旅于明年之次，以害鸟帑。周、楚恶之。”同一年的岁星失次，周王、楚子同时遭遇厄运？孔颖达解释道：“天之分野，鹑火周分，鹑尾楚分，岁星之冲，当此周、楚之分，故周王、楚子受其咎也。”<sup>[7]</sup>

鹑首、鹑火与鹑尾三次，所对应的恰是南方朱鸟七宿的东井、鬼、柳、七星、张、翼、轸等七颗星，朱鸟七星也就由鹑首、鹑火、鹑尾构成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载：柳为鸟注，即鸟喙；七星，颈；张为喙；翼为羽翮。《春秋文耀钩》曰：“昧为鸟阳，七星为颈。”宋均注云：“阳犹首也。柳谓之昧。昧，鸟首也。七星为朱鸟颈也。”<sup>[8]</sup>柳、星、张、翼，西首而东尾，构成了朱鸟的形象。班固云：“自柳三度至张十二度，谓之鹑火之次，周之分也。”<sup>[9]</sup>由此可知，鹑火由柳、星、张三星构成：昧（柳）为鸟首，星为鸟颈，张为鸟喙。所以，柳、星、张为周的分野。翼、轸二星构成的鹑尾，也就是楚国的分野。所以，“周王、楚子恶之”。

分野并不是一种科学划分，而是辨吉凶、观妖祥思想指引下的天命区域化，是政治地理的划分。春秋时代，这样的分野与灾异观念已经很成熟了，并且在学人中、在政治上广为流传。宋人易祓论曰：“星土，十二土也，本属十二州。成周袭乎夏殷，

合而言之九州而已。诸侯之国，不能皆有分星，大率以州举之。故在诸侯，则谓之分星；在九州，则谓之星土九州。”<sup>[10]</sup>天上星座和地上区域对应关系的建立始于何时已不可考，但天地对应的思想渊源却由来已久。司马迁家族，世守天官，于周为太史，于汉为史官，故能将“传天数者”追溯得很久远，司马迁云：“昔之传天数者：高辛之前，重、黎；于唐、虞，羲、和；有夏，昆吾；殷商，巫咸；周室，史佚、苒弘；于宋，子韦；郑则裨灶；在齐，甘公；楚，唐昧；赵，尹皋；魏，石申。”<sup>[11]</sup>史官主知天道是周代以来的共识。“传天数者”不绝，分野学说丰富并逐渐成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。

## 二 星土分野与地理系统的动态整合

有两种星土分野方式流传最广、影响最大，即十二次分野和二十八星宿分野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同为对黄道带的分割，两种分野方式是同源异形的，只是历史表现形式有所差异<sup>[12]</sup>。十二次分野所对应的十二国是：星纪为吴、越，玄枵为齐，娵訾为卫，降娄为鲁，大梁为赵，实沈为晋，鹑首为秦，鹑火为周，鹑尾为楚，寿星为郑，大火为宋，析木为燕。钱宝琮指出：“除鹑首、鹑尾、寿星、析木四次外，其八次之名俱见《左氏传》，确系春秋时代之天文家言，其名义及分野可得而详也。”<sup>[13]</sup>实际上，《国语》也出现了鹑尾、寿星的分野，如《晋语四》载：“岁在寿星及鹑尾，其有此土乎？天以命矣，复于寿星，必获诸侯”，所以，在春秋时代十二次的分野已经基本成熟起来。

二十八宿分野是在大一统国家建立起来后逐渐完善的，并以其详细而完备的形式，逐渐成为主流的分野方式。司马迁《史记·天官书》以及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组织士人编写的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，还有东汉班固《汉书·地理志》都有详细记载。只不过《天官书》是易被认为的“星土九州”，而后两者是分星而已。

在讨论二十八宿分野前，必须先清楚九州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，为了贡赋的需要，大禹将天下方域划分为九州：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扬州、荊州、豫州、梁州、雍州。这一划分，为主掌

天文者提供了完善分野学说的条件。

何谓九州？河、汉之间为豫州，周也。两河之间为冀州，晋也。河、济之间为兖州，卫也。东方为青州，齐也。泗上为徐州，鲁也。东南为扬州，越也。南方为荊州，楚也。西方为雍州，秦也。北方为幽州，燕也。<sup>[14]</sup>

这是将地域与封国之间建立起联系，为判断星象变化所带来吉凶运势奠定了基础。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记载了天上的分星——九野与九州的对应关系。“中央曰钧天，其星角、亢、氐。东方曰苍天，其星房、心、尾。东北曰变天，其星箕、斗、牵牛。北方曰玄天，其星婺女、虚、危、营室。西北曰幽天，其星东壁、奎、娄。西方曰颢天，其星胃、昂、毕。西南曰朱天，其星觜、参、东井。南方曰炎天，其星舆鬼、柳、七星。东南曰阳天，其星张、翼、轸。”<sup>[15]</sup>这种分野说是按照八方加中央共九个方位，将二十八星宿也分成了九个区域，形成了天地的对应关系。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的地域与星辰的对应关系并不十分清晰，仅是天人同构思想或者理论的初形。《春秋元命苞》曰：“王者封国，上应列宿之位。其余小国不中星辰者，以为附庸。”<sup>[16]</sup>王者所封的诸侯国，对应着星宿；小的诸侯国，只能作为大国的附庸而存在，占验时以所附之国的星宿为准，这是在为九州对应九国（周的问题比较复杂，这也是分野说抵牾之处）做出解释，以弥补九州分野说的漏洞。

古人认为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天环一周为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，二十八宿被安排在周天固定位置上。二十八宿不是二十八颗星，而是二十八组星，而构成每一组星的数量不同，即大小不同，所以二十八宿，每宿所占的度数不同，四象度数也并非均分，故分星有多有寡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首先列出了二十八宿与十三州分野的对应情况：“角、亢、氐，兖州。房、心，豫州。尾、箕，幽州。斗，江湖。牵牛、婺女，扬州。虚、危，青州。营室至东壁，并州。奎、娄、胃，徐州。昂、毕，冀州。觜、参，益州。东井、舆、鬼，雍州。柳、七星、张，三河。翼、轸，荊州。”从九州发展到十二州、十三州，说明了分野理论是一个动态成熟的过程。《禹贡》九州有梁州，《天官书》

无，却出现了益州、幽州、三河、江湖等州。三河是汉代设立的，《括地志》云：“汉武帝置十三州，改梁州为益州、广汉。”<sup>[17]</sup>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。幽州古已有之，多出来的江湖，邱靖嘉认为，为了解决二十八星宿对应十三星区的问题，从扬州析出江、湖，也就是把吴、越从传统的地理分区中区隔开来<sup>[18]</sup>。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。

《史记·天官书》又载：“二十八舍主十二州，斗秉兼之，所从来久矣。”张守节注引《星经》云：“角、亢，郑之分野，兖州；氐、房、心，宋之分野，豫州；尾、箕，燕之分野，幽州；南斗、牵牛，吴、越之分野，扬州；须女、虚，齐之分野，青州；危、室、壁，卫之分野，并州；奎、娄，鲁之分野，徐州；胃、昂，赵之分野，冀州；毕、觜、参，魏之分野，益州；东井、舆、鬼，秦之分野，雍州；柳、星、张，周之分野，三河；翼、轸，楚之分野，荆州也。”<sup>[19]</sup>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吴、越以及上文十二次分野之吴、越，在地理区域上并没有分开，故吴、越的分星相同。这些都支持了邱靖嘉的判断<sup>[20]</sup>。

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分野之外，还有北斗七星的分野，五大行星的分野，十天干十二地支以及十二月的分野等<sup>[21]</sup>。《晋书·天文志》载：“班固取《三统历》十二次配十二野，其言最详。又有费直说《周易》、蔡邕《月令章句》，所言颇有先后。”<sup>[22]</sup>蔡邕的《月令章句》不见得合理，但却促进了分野理论空间的拓展。三国西晋时期学者皇甫谧所作《帝王世纪》，将律吕加入分野体系，使分野内容更加丰富，也更加人文化。吕传益认为：“早期分野都是地域大范围的勾勒，最初星空只与古国对应，州出现后加入了与州的对应，后来又从州国具体到更加细致的郡县。分野的发展趋势一直是朝着将天地对应的州、国和郡县与十二次和二十八宿融合起来，并给出入宿度数。”<sup>[23]</sup>分野越详细，与实际要说明的问题出入也越大。但是，随着谶纬之风兴起，并在政治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星占术的功能和价值被无限放大，分野说简单的休咎指向，已经广泛地深入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层面，形成了以分野为核心的文化体系。

秦汉时代，尤其是汉代，分野学说越来越缜

密，分野的类型、体系也越来越多。这些分野学说，只不过是天官或术士，期冀解读天意，且有挟天意或者自立学说危言耸听以自重的目的所创。但是，这种将天文与人事相杂以观察地理的学说，也促使人们了解地域分布的客观属性，尤其是五行理论的介入，使分野学说更具系统性。由于划分详细、流传广泛，分野学说成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，影响深广。当然，无论何种分野学说皆是臆造，但作为非科学想象的分野学说，却客观地实现了文化的拓展，尤其是在与民俗文化、礼乐文化紧密结合后，为文学地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### 三 礼乐与民俗文化浸润着文学地理

天文分星与地域虽无客观联系，在天人感应学说指导下，结合了阴阳五行理论所形成的天文分野说，却为汉人所深信。尤其是在谶纬流行以后，神道设教思想进入学术领域，天文分野说大行其道，在学术上引起了汉儒的高度重视。班固作《汉书·地理志》直接将天文分野之地域与文学进行类比，同时融入民俗成分，使《诗》学地理学的思想清晰地呈现出来。《地理志》将九州按区域划分为十三个部分，也就是十三州，介绍了每个地域的分野、界域、历史沿革以及风俗等，同时结合《诗经·国风》中区域诗歌特点加以说明，文学与地域、民俗的关系从中得到了充分体现。

1. 秦豳同咏，故有夏声。秦人原本是生活在泾渭之间的游牧民族，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而被赐封岐、丰之地，始为诸侯，逐渐占据周人故地。《地理志》记载：“秦地，东井、舆鬼之分野。”自井十度至柳三度，又谓鹑首之次。《诗》《风》兼秦、豳两国。秦地风俗有两个特点：

一是具有“先王遗风，好稼穡，务本业，故《豳诗》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”的特点。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（前544），吴札观乐认为秦为夏声，“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季札可谓一语成谶，秦不仅能作夏声，而且“大之至”，最终统一六国。《诗含神雾》曰：“秦地，处仲秋之位，男懦弱，女高腴，白色秀身，律中南吕，音中商，其言舌举而仰，声清以扬。”此就汉代而言，

系律吕分野理论观察的结果,也说明了故秦之地的音乐文化特点。值得一提的是,即便是情歌,秦人也表现得富于张力,“《蒹葭》、《秋水》,其思凉,犹秦西风之变乎”<sup>[24]</sup>,也是“声清以扬”的体现。

二是其民修习战备,尚气力,以射猎为先。《诗经》之《车辚》《驷驖》《小戎》《无衣》等,言车马田狩作战之事,颇有同仇之气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云:“东井鬼星散为雍州,分为秦国。东距殽阪,西有汉中,南含高山,北阻居庸,得东井动深之萌,其气险也。”<sup>[25]</sup>秦国得气之深萌,故谓之险。《春秋说题辞》云:“秦金精坚,故秦俗亦坚”,二者含义是一致的。其气险,则个性坚刚,有舍生忘死之义,诗歌往往体现出刚烈之意。

班固论之曰:陕西、甘肃一带秦人所居之地,“迫近羌胡,民俗休习战备,高上勇力鞍马骑射。故《秦诗》曰:‘王于兴师,修我甲兵,与子偕行。’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,今之歌谣慷慨,风流犹存耳。”<sup>[26]</sup>朱熹注《诗》也看到了这一点,论《无衣》三章曰:“秦人之俗,大抵尚气概,先勇力,忘生轻死,故其见于诗如此。……雍州土厚水深,其民厚重质直,无郑、卫骄惰浮靡之习。”<sup>[27]</sup>秦国诗歌呈现的民俗特点和地域文化特征,朱子总结得尤为精辟。崔述也说:“《无衣》,平日诗也,而志切于戈矛,意在于同仇。行阵也而衽席视之,锋镝也而寤寐依之,则临敌可知矣。其风俗之劲悍如是,天下谁复能当其锋者?”<sup>[28]</sup>诚为确论。

2. 三晋湛深之思与慷慨悲烈。公元前1033年,周成王封弟叔虞于古唐国,叔虞子燹徙居晋水边,改国号为晋。陶唐氏主叁星,叁星也就成为晋的分星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:“自毕六度至井十度,谓之实沉之次,立夏、小满居之,晋之分野。”季札观乐,闻《唐风》曰:“思深哉!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?”班固释之:“其民有先王遗教,君子深思,小人俭陋。”<sup>[29]</sup>《诗含神雾》则曰:“唐地,处孟冬之位,得常山大岳之风,音中羽,其地硗确而收,故其民俭而好畜,外急而内仁,此唐尧之所处。”晋人有陶唐氏仁厚之风,羽音清澈,故曰思深。

公元前376年,韩、赵、魏“灭晋侯而三分其地”,成为诸侯。班固曰:“赵地,昴、毕之分野。……丈夫相聚游戏,悲歌慷慨,起则椎剽掘冢,

作奸巧,多弄物,为倡优。女子弹弦跕躑,游媚富贵,遍诸侯之后宫。”<sup>[30]</sup>男人慷慨悲歌,蓄娼妓;诸侯后宫多妩媚的赵姬,赵国风俗可见一斑。《隋书》曰:“胃七度至毕十一度,为大梁,属冀州。”隋代的冀州所辖范围与汉代冀州刺史部两者大部分重叠。“人性多敦厚,务在农桑,好尚儒学,而伤于迟重。前代称冀、幽之士钝如椎,盖取此焉。俗重气侠,好结朋党,其相赴死生,亦出于仁义。故《班志》述其土风,悲歌慷慨,椎剽掘冢,亦自古之所患焉。”<sup>[31]</sup>历史变迁,风俗习惯并没有大的改观。如果说有改变,汉代重学以来,至于隋唐,其民颇知礼仪。

燕、赵北部都处于与游牧民族活动范围的结合部,民族之间的生存摩擦历来不断,燕赵间的族群性格与风俗比较接近。韩愈《送董邵南序》就说:“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”,如果说战国后宫中赵姬的曼舞是一种风俗,“慷慨悲歌”最容易使我们想起易水河畔的荆轲,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,豪放和悲凉尽显燕赵人的品格。司马迁概括为:“人民希,数被寇,大与赵代俗相类,而民雕悍少虑。”<sup>[32]</sup>班固称其为“燕丹遗风”。<sup>[33]</sup>民有赴死之义,故能慷慨悲歌,尽显豪迈悲壮。

3. 殷商故地的骄惰浮靡。公元前375年,韩哀侯灭了郑国,占据了郑国大部分领土。陈、郑与韩国分星相同,角、亢、氐是也。“右雒左沛,食溱、洧焉。土陋而险,山居谷汲,男女亟聚会,故其俗淫。”<sup>[34]</sup>此郑国风俗,也适用于韩国。季札所谓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,是其先亡乎?”既是对郑国诗歌的评价,也是对郑国国运的榷诂,可谓一语中的。不仅郑国,占有其地的韩国,也率先被秦国所灭。

周武王灭商,封微子启于“阙伯之墟”,为宋公。传七世而至戴公,宋大夫正考父校《商颂》十二篇于周太师,以《那》为首,归宋祀其先王。鲁襄公二十九年(前544),季札聘鲁观乐,所观之颂当有《商颂》。“至矣哉!直而不倨,曲而不屈,迥而不逼,远而不携,迁而不淫,复而不厌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。”这是一种内在性的评价,故班固说:“其民犹有先王遗风,重厚多君子,好

稼穡，恶衣食，以致畜藏。”<sup>[35]</sup>鲁哀公八年（前487），宋景公吞并了曹国。故宋人风俗，在《商颂》的基础上，兼具《曹风》的特点。朱熹所云“骄惰浮靡之习”不仅郑卫如此，殷商故地所建立起来的姬姓诸侯国也沾染了轻浮淫靡的习气。班固说：“河内本殷之旧都，周既灭殷，分其畿内为三国，《诗》《风》邶、庸、卫国是也”，季札观周乐，“为之歌《邶》《鄘》《卫》之歌，曰：‘美哉，渊乎！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，是其《卫风》乎！’”

营室、东壁是卫地的分野。“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会，声色生焉，故俗称郑卫之音。”<sup>[36]</sup>因为浪漫而多情，郑风、卫风被称为“郑卫之音”。基于“郑卫之音，乱世之音也”“桑间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”的儒学认知，喜好“郑卫之音”的君王往往会被规谏。子夏曾经评价说：“郑音好滥淫志，宋音燕女溺志，卫音趋数烦志，齐音敖辟乔志。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显然，齐人的音乐以及风俗亦在儒家士人批判之列。后世论乐以及风俗，皆以郑、卫为比。阮籍《乐论》曰：“造始之教谓之风，习而行之谓之俗。楚越之风好勇，故其俗轻死；郑卫之风好淫，故其俗轻荡。轻死，故有火焰赴水之歌；轻荡，故有桑间濮上之典。各歌其所好，各咏其所为。”郑卫音乐的俗乐特点，由此引发的人格精神以及文学风格变化，是学者们探讨地域文学的有力支撑。

4. “齐一变至于鲁”：齐鲁不同俗。齐地之分星为虚、危；鲁地之分星为奎、娄，是北方玄武七星的后四星。班固曰：“《诗》《风》齐国是也，临淄名营丘，故《齐诗》曰：‘子之营兮，遭我乎蟊之间兮。’又曰：‘俟我于著乎而。’此亦其舒缓之体也。吴札闻齐之歌，曰：‘泱泱乎大风也哉！其太公乎？国未可量也。’”<sup>[37]</sup>季札所言是齐国称霸诸侯的预言，其风俗已经有大国的气魄。太史公也有类似的观点，“其民阔达多匿知，其天性也。……洋洋哉，固大国之风也！”<sup>[38]</sup>班固认为，《齐风》于此形成了具有大国气度的舒缓之体，即“舒缓阔达而足智”<sup>[39]</sup>。“齐气”便成为后人评价齐人文风的标准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以为：“王粲长于辞

赋，徐干时有齐气，然粲之匹也。”李善注曰：“言齐俗文体舒缓，而徐幹亦有斯累。”<sup>[40]</sup>此说为刘勰所称颂，齐气便成为齐地文学的特征之一。

相比于齐国，鲁国可以称道的就是践行周礼，宣扬圣人教化。孔子倡导的践行周公之道，成为洙泗之间的风俗。到了汉代，每论向学之风，往往比之齐鲁诸儒。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“齐俗冠带，以礼相提。”<sup>[41]</sup>这是齐鲁同风的体现。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虚、危之精，流为青州，分为齐国。”武王伐殷，封师尚父于齐，都营丘。何以称为“齐”？《史记·封禅书》解释说：“齐所以为齐，以天齐也。”与“天齐”，实际上有与周平等的内涵。而质之以《太康地记》“东方少阳，其色青，其气清，岁之首事之始，故以青为名焉”<sup>[42]</sup>，知青州之名深受阴阳五行的影响。然而《齐风》多为爱情之诗，为礼义之士所鄙薄。《诗经》没有鲁风，而有《鲁颂》。鲁国人处处以礼仪自居，站在德治的高点上，生活在故祖的余荫下，沾沾自矜，而无文化上的超越。建宁二年（169），鲁相史晨立《孔子庙碑》曰：“臣蒙厚恩受任符守，得在奎娄周、孔旧宇。”<sup>[43]</sup>奎娄不仅仅是鲁国的代指，与德政与礼乐已经建立其内在的联系。

5. 荆楚、吴越的绮丽钟灵。周夷王时，中央政权开始衰弱，诸侯始大，到了楚庄王时，确立了春秋霸主的地位。进入战国时代，楚国也趁机进行领土扩张。在楚威王时，楚国的领土已扩张至巴、蜀，又灭越国。楚怀王派兵攻占原吴越统治的地区，并设立江东郡。据王国维考证，秦灭楚后，在楚地设置了八个郡，分别是南郡、九江、泗水、东海、长沙、薛郡、黔中、陈郡。所以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楚地，翼、轸之分野也。今之南郡、江夏、零陵、桂阳、武陵、长沙及汉中、汝南郡，尽楚分也。”<sup>[44]</sup>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，民食鱼稻，以渔猎山伐为业，“信巫鬼，重淫祀”。“汉中淫失枝柱，与巴蜀同俗。”<sup>[45]</sup>

吴王阖闾之子夫差为王二十三年，一度强大的吴国被越王勾践所灭。勾践灭吴后，北渡黄河，在徐州与齐、晋诸侯会合，向周王室进献贡品。周元王派人赏赐祭肉给勾践，称他为“伯”。勾践离开徐州，渡过淮河南下，把淮河流域送给楚国，把

吴国侵占宋国的土地归还给宋国。把泗水以东方圆百里的土地给了鲁国。楚怀王二十三年（前306），楚国乘越内乱的时候，发兵攻陷了越国，设江东郡。所以，班固说：“其失巧而少信。……吴粤与楚接比，数相并兼，故民俗略同。”<sup>[46]</sup>《地理志》又曰：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，作《离骚》诸赋以自伤悼。后有宋玉、唐勒之属慕而述之……枚乘、邹阳、严夫子之徒兴于文、景之际。……严助、朱买臣，贵显汉朝，文辞并发，故世传《楚辞》。”<sup>[47]</sup>这是文学地理的典型描述。

#### 四 星土分野的文学价值

作为星占术的天文分野，是巫觋观测星空变化的直接体现。班大为认为：“证据已经指明，星占学的宇宙结构学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化发展过程，可追溯到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夏商周三代。”<sup>[48]</sup>顾炎武认为，三代以上人人懂得天文。此话固然有些绝对，但是，三代以来天文知识得到普遍传播还是被公认的。天文分野作为星占的手段，即便人们不相信巫术而祛除其神秘成分，分野作为天文地理知识已经在民间流行。班固《地理志》将天文分野和地域文化以及诗歌特点进行综合论述，强化了天文分野的民俗文化以及文化意义。作为流传久远而又被普遍接受的天文分野，也介入了中国的文学传统，对于丰富文学内容，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。

1. 衍生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。从天文分野理论发展来看，到了汉代，已经形成了天文、地域、物宜相结合的礼乐文化体系性的表达方式，体现了《周易》“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”（《系辞下》）精神旨趣，最终目的是“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”，而“通德”“类情”的诗意表达，即天、地、鸟文（地宜）三维叙事模式，演化成为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。

在商周之际，已经有了岁星纪时方式，甲骨卜辞出现了“贞，隹火。五月”（《甲骨文合集》6822）等祭祀大火星的记载。《尚书·尧典》的四仲星，成为确定农时的季节性星象标志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“武王代殷，岁在鹑火”，《晋语

四》“晋之始封也，岁在大火，阍伯之星也”，《左传·昭公八年》楚灭陈，“岁在鹑火”，等等，都是与分野有关的历史叙事。而这种叙事方式是将天象与历史事件糅合在一起。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经云：“春，王正月，有星出于婺女。”如此简单的天文事件描述，在传天数者——郑国裨灶眼中具有深刻的内涵。他对子产曰：“七月戊子，晋君将死。今兹岁在颛顼之虚，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，居其维首，而有妖星焉，告邑姜也。邑姜，晋之妣也。天以七纪，戊子，逢公以登，星斯于是乎出，吾是以讥之。”裨灶的论述蕴涵三重逻辑：第一，其时岁星在颛顼之虚，颛顼之墟为玄枵，即十二星次之玄枵。与玄枵相对应的二十八宿是北方玄武的女、虚、危三星。玄枵是齐的分星，青州为之星土。姜氏、任氏居住其地，岁星所在，故姜氏、任氏无咎。第二，婺女即北方玄武的第三星女宿（又称须女、织女），意谓出嫁之女。妖星犯婺女，婺女是齐之婺女——邑姜，姜太公女、晋唐叔虞之母。齐有岁星佑护，故齐之婺女得其咎，即邑姜子孙受其祸，晋君必死。第三，殷商诸侯逢公居齐，将死之时，也出现了妖星犯婺女的天象，但是，当时岁星没有在齐，故逢公自当其祸，在戊子日卒。果然，秋七月“戊子，晋平公卒”。这是非常精彩的天文分野理论的实践分析。简单的天文叙事，用天文分野理论阐释，增加了叙事的张力及其内容的丰富性，体现了天文分野介入叙事所呈现的文学价值。班固《西都赋》“仰悟东井之精，俯协河图之灵”，东井是秦地分星，西都即为秦之故地。庾信《哀江南赋》“以鹑首而赐秦，天何为而此醉”，十二星次分野，鹑首为秦地分野。分野的介入，不仅增加了叙事的趣味性，而且丰富了文学表达的内涵。

维柯认为：“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，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，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，因为这一切理由，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。从这种粗糙的玄学，就像从一个躯干派生出肢体一样，从一股派生出逻辑学，伦理学，经济学和政治学，全是诗性的；从另一股派生出物理学，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，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，即时历学和地理学，提供确凿

可凭的证据——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。”<sup>[49]</sup>最初天文分野学说的建立，是占验性质的，荒诞的，虽然粗糙，但是派生出了浓厚的有意味的话语模式，丰富了文学文本的生成方式。

2. 生成了特殊的文学意象。战国降及秦汉，天文分野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，出现了多种分野方式，尤其是星土分野的观念和《诗经·国风》所体现的地域风格相互结合，班固的地理界说、民俗分析与诗歌特色的综合考察以及理论概括，使天文分野逐渐凝固成一种文化符号，成为文学中广泛使用的意象。

《春秋文曜钩》载：“楚立唐氏，以为史官，苍云如蜺，围轸七蟠，中有荷斧之人，向轸而蹲，楚惊。”<sup>[50]</sup>楚人为何大惊失色呢？在《春秋元命苞》里可以找到答案。“轸星散为荆州，分为楚国。荆之为言强也，阳盛物坚，其气急悍也。”也就是说，轸星是楚国的分星，是楚国的代名词，故庾信《哀江南赋》曰：“赤鸟则三朝夹日，苍云则七重围轸。”娴熟运用分野知识进行诗歌创作，最为典型的是唐代的王勃。在《滕王阁序》中说：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。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。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瓯越。物华天宝，龙光射牛斗之墟。”南昌在故豫章地，春秋属吴地，战国属楚，汉代隶属于豫章郡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入于吴地。因为战国为楚所吞并，王勃直接道明南昌的分星是翼、轸，而牛、斗是吴地的分野，吴、楚相邻，故曰“龙光射牛斗之墟”。分星作为被士人接受的知识体系，作为意象，在诗文中不断出现。虞世南《赋得吴都》诗曰：“画野通淮泗，星躔应斗牛。”上文已知，斗、牛是吴地分野。褚亮《赋得蜀都》诗曰：“列宿光舆井，分芒跨梁岷。”战国时期秦并巴蜀以为郡县，所以属于秦地，东井、舆鬼为之分野。“箕尾分星野，轩辕肇帝墟。燕山蟠王气，瀛海带宸居。”<sup>[51]</sup>这是孟思咏北京的诗句。北京其地，周代隶属于燕国。燕国的分野是箕尾星，瀛海一代又是故辰国属地，故有以上诗句。流传极为久远的天文分野说，廓去了芜杂的占卜成分，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。不仅作为文学意象被诗人、文学家津津乐道，也成为学者进行地志研究的地理坐标。

3. 承载天命思想的文学主题。由于蕴涵人事吉凶祸福的预测，天文分野知识的文学运用，自然会使得文学作品流露出天命思想的成分。秦始皇帝常说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于是东巡以厌之。范增说项羽曰，刘邦气呈龙虎，有五彩，认为是“天子气”。二者所谓“天子气”都是指刘邦气运而言。《河图握矩记》云：“刘受纪，昌光出轸，五星聚井。”刘邦为沛县之丰邑人。战国时，沛县原属于宋国，后入楚国。楚国的分野为翼轸，所以沛县的分野即为轸，分野在这里起到了指示性的作用，同时也蕴含着天命所归的神秘思想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：“汉元年十月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以历推之，从岁星也。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。……东井秦地，汉王入秦，五星从岁星聚，当以义取天下秦。”班氏直言不讳地解释说：“（刘邦）与秦民约法三章，民亡不归心者，可谓能行义矣，天之所予也。”<sup>[52]</sup>其又在《西都赋》歌之曰：“大汉受命而都之也，仰悟东井之精，俯协河图之灵。”乃父班彪《王命论》尤为明确地说：“秦皇东游以厌其气，吕后望云而知所处。……西入关则五星聚。”汉王元年（前206），汉邦西入关中，适逢出现五星聚于东井的天文奇象，时人认为是刘邦得天下的符命，歌颂的意味非常鲜明。

我们知道，周天子封微子启于商丘，建立了宋国。在显德六年（959）六月，周世宗拜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，驻商丘。赵匡胤建国，国号即为宋。景德三年（1006），宋真宗将已经更名为宋州的商丘，命为“应天府”，以此纪念乃祖，顺应天命，开创宋朝基业。所以，张方平《论并废汴河札子》云：“太祖皇帝始造有宋，盖自宋受命而有天下，故为建国之称，表于万世。真宗皇帝深惟祖宗功德，乃升为应天府，遂号南京。”<sup>[53]</sup>欧阳修《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铭》曰：“南京圣宋所以受命建号，而大火主于商丘，国家乘火德而王者也。”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宋人胡宿《正阳门赋》，曰：“有宋受命，惟皇建国。获九金之神鼎，应五精之火德……于是即房心之广野，据神明之华域，得天帝布政之廷。”<sup>[54]</sup>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分野学说在宋代颇为流行。宋人诗文中，将宋代应火星之分野而建立大宋，明白无误地讲述出来，分野作为天命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4. 彰显了文学地理学的初型。随着星占理论的广泛流传以及普遍接受,《左传》记载的单一的星土分野,已经不能满足儒生术士理论推演的需要,故分野理论的边界不断扩大,出现了泛化的现象。天干、地支,四时、月份、节气以及律吕知识被吸纳到天文分野体系之中,形成了颇具地域文化特色的理论界说。如《诗含神雾》载:

夫齐之地,处孟春之位,海岱之间,土地污泥,流之所归,利之所聚,律中太簇,音中宫角。陈地,处季春之位,土地平夷,无有山谷,律中姑洗,音中宫征。曹地,处季夏之位,土地劲急,音中征,其声清以激。秦地,处仲秋之位,男懦弱,女高膝,白色秀身,音中商,其言舌举而仰,声清而扬。唐地,处孟冬之位,得常山大岳之风,音中羽,其地硃确而收,其民俭而好畜,此唐尧之所处。魏地,处季冬之位,土地平夷。<sup>[55]</sup>

这是以律吕进行分野的一种尝试,即用音乐的特性标示地域民俗的不同。应劭《风俗通义序》云:“风者,天气有寒暖,地形有险易,水泉有美恶,草木有刚柔也。俗者,含血之类,像之而生,故言语歌讴异声,鼓舞动作殊形,或直或邪,或善或淫也。圣人作而均齐之,咸归于正;圣人废,则还其本俗。”<sup>[56]</sup>此说得风俗之正解。秦与齐两个诸侯国,不仅是东西方的两个大国,风俗也迥异,表现出的文学特色截然不同。秦人的慷慨豪迈,齐人的舒缓大度,这是天文分野极力扩张并进行界定的理论根据。反过来说,天文分野也促成了地域文学的发展认知,起到了补益的作用。

宋人程公说曾经总结说:“大伯逊国,去之荆蛮……仲雍嗣之,断发文身,裸以为饰,不与中国通,盖古扬州地也。《禹贡》:‘淮海惟扬州,彭蠡既猪,阳鸟攸居,三江既入,震泽底定,厥土惟涂泥,沿于江海,达于淮泗。’《周礼·职方》:‘东南曰扬州’,在天文星纪之次,斗牛之分,辰居丑宫曰磨蝎。其境襟三江带五湖,阻大海达长淮。……杜佑曰‘扬州人性轻’,扬地非形势,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。”<sup>[57]</sup>虽然是在总结地理沿革、民俗风物,然而其所透露出的文学地理的信息,是非常有价值的,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文学地理的新视点。

5. 成为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逻辑起点。星空是大地的倒影,星土分野从表面上看,是以星占为手段来预知人事,但其实质却是将人事附会于星空。因此,分野学说同文学的联系,实质上是地缘和文学的联系。汉代人已经注意到地缘对于人文风俗以及文学的影响。如班固所云,郑国“右雒左洧,食溱、洧焉。土陋而险,山居谷汲”,这样的民人性格率真质朴,保留着原始的浪漫多情,所以它的诗歌被道家贬斥诋毁。刘勰对此也进行了个案分析:“山林皋壤,实文思之奥府,略语则阙,详说则繁。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,抑亦江山之助乎!”<sup>[58]</sup>地理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问题就成为文学理论一个重要的命题。宋人林駟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,他说:“张燕公谪岳州,而诗益凄惋,人以为江山之助。杜工部自夔州后,所著篇什,皆不待斧斤而自合。柳子厚南迁后,作曹溪南岳诸碑,妙绝古今,东坡称叹不能自己。”<sup>[59]</sup>林氏洞见了不同地域对于个体文学风格形成的影响,可以说在刘勰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。地理环境,或者说地理生态,对于群体个性、人文精神的生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,而这些影响又是个体文学语言、想象空间、文学特色形成的必要基础。所以,我们认为星土分野影响下的地理区域、地理空间的划分以及不同地理空间所造成的整体性格、风俗习惯、文学修养、文学表现则是传统地理诗学建立的一个可以参考的逻辑起点。

分野学说是中国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,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(《周易·贲》)传统思想的具体表现,目的是建立起以天文为核心的理论模式、话语模式。在继承先秦分野思想的基础上,分野的模式以及理论体系到了汉代基本成熟与完善起来,且在“神道设教”天人之学泛滥的汉代政治、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分野学说的理论深化促使人们去探寻地域文化及其政治影响,其中不免涉及人文风俗与地理风貌的关系,而地理系统进入文学叙事空间,不仅仅生成了有意味的文学叙事模式、稳定的文学意象,也承载着浓厚政治旨向的主题;天文地理向文学挥洒情思,文学因此拓展了表现话语、叙事空间,形成了带有地理学特点的理论,这是分野学说的文学贡献。

[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古典学与中国

早期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”(项目编号 20&ZD263)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]

- [1] 苏伯衡:《分野论》,见《明文在》,薛熙编,第213页,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。
- [2][3][7] 孔颖达:《春秋左传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1941—1942页,第2023页,第1999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4] 徐彦: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324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5] 孔颖达:《毛诗正义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620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6][42] 邢昺:《尔雅注疏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609页,第2615页,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8][16][24][25][41] 赵在翰:《七纬》,钟肇鹏、萧文郁点校,第453页,第394页,第250页,第413页,第631页,中华书局2012年版。
- [9][26][29][30][33][34][35][36][37][39][44][45][46][47][52] 班固:《汉书》,颜师古注,第1651页,第2998—2999页,第1649页,第1655页,第1657页,第1652页,第1664页,第1665页,第1659页,第1661页,第1665页,第1666页,第1668页,第1668页,第1301—1302页,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- [10] 易祓:《周官总义》卷十六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经部第92册,第47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。
- [11][17][19][32][38] 司马迁:《史记》,裴骃集解,第1343页,第1330页,第1346页,第3265页,第1513页,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- [12] 冯时认为,十二次分野,“实际只是二十八宿恒星分野的不同表现形式”,“是占星家刻意追求的一种理想形式”。参见冯时《中国天文考古学》,第79页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。
- [13] 钱宝琮:《论二十八宿之来历》,《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》,第337页,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。
- [14][15] 许维遹:《吕氏春秋集释》,梁运华整理,第278页,第276—277页,中华书局2009年版。
- [18][20] 邱靖嘉:《天地之间:天文分野的历史学研究》,第123页,第113—114页,中华书局2020年版。
- [21] 参见王洪军《星土分野说的理论建构与礼乐文化的融合》,《中原文化研究》2021年第2期。
- [22] 房玄龄等:《晋书·天文志上》卷十一,第307页,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- [23] 吕传益:《中国古代占星术中的分野》,《长江文史论丛》2017年。
- [27] 朱熹:《诗集传》卷六,王华宝整理,第91页,凤凰出版集团2007年版。
- [28] 崔述:《读风偶识》,《崔东壁遗书》,第566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。
- [31] 魏征、令狐德棻:《隋书·地理志中》卷二十五中,第859页,中华书局1973年版。
- [40] 《文选》卷五十二,李善注,第720页,中华书局1977年版。
- [43] 赵明诚:《金石录》卷十六,第302页,中华书局2019年版。
- [48] 班大为:《中国早期分野星占学的特征》,见《中国上古史实揭秘:天文考古学研究》,徐奉先译,第304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。
- [49] 维柯:《新科学》,朱光潜译,第155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- [50] 安居香山、中村璋八:《纬书集成》,第665页,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。
- [51] 《宸垣识略》,吴长元辑,第5页,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。
- [53] 《全宋文》第19册,曾枣庄、刘琳主编,第165页,巴蜀书社1990年版。
- [54] 《全宋文》第11册,曾枣庄、刘琳主编,第104页。
- [55] 孙穀:《古微书》卷二十三,第430—431页,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。
- [56] 王利器:《风俗通义校注》“序”,第8页,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
- [57] 程公说:《春秋分记》卷三十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经部第154册,第324页。
- [58] 范文澜:《文心雕龙注》卷十,第695页,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。
- [59] 林駟:《古今源流至论后集》卷一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,子部第942册,第9173页。

[作者单位: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]

责任编辑:赵 培